

中国读本

李致忠 著

# 中国古代书籍



人们描述中国的初期书籍，多以商周时期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资料为例，但初期书籍可能早就产生，只是没有流传至今的文字记录。当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经过加工整理，成为系统地阐述、宣传、介绍、传播某些问题、某种经验和知识时，便成了正规书籍，可以认定，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之前，中国已经产生了正规书籍……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中国的古代书籍

李致忠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书籍 / 李致忠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1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45-0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图书史—中国—古代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0758号

## 中国古代书籍

著者	李致忠
责任编辑	刘川民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80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0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45-0/G·1294
定 价	16.8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 第一章书籍与书籍史

一什么是书籍

二书籍史的主要内容

## 第二章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一语言、传说与记事

二文字的起源与形成

三初期书籍的产生

## 第三章正规书籍的产生与历代书籍的创作

一正规书籍的产生

二历代书籍的创作

## 第四章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一书籍的生产材料

二书籍的生产方法

## 第五章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

一中国古代书籍的版面设计

二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

三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

## 第六章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

一整治书籍的制作材料

二书籍的阅藏保管

三维修保护

# 第一章书籍与书籍史

## 一什么是书籍

关于什么是书籍，在现代人的思绪里几乎都有清晰的概念，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要是较起真儿来，这“书籍”一词的形成与演变，还真需要作个简单的交代。

“书籍”在古代亦称为“典籍”、“载籍”。《春秋左传注疏》卷七十四《昭公十五年》谓“昔而高祖孙伯廌，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孔颖达《正义》解释说“高祖”指高远之祖，九世孙伯廌为晋之正卿，掌典籍有功，是为大政，故曰籍氏。后世将典册书籍统称为典籍，盖缘于此。《孟子·告子下》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东汉赵岐给这句话作注，说是典籍者“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也就是登录有关法度方面的书册典籍。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则说：“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这里的“典籍”与“书籍”显然是同一个意思了。

《史记·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这里的“载籍”显然也是“书籍”的同义语。但“书籍”二字连读发展为一个词，其起源似乎比“典籍”、“载籍”还要更晚一些。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相传黄帝时有位史官叫仓颉，他最初创造了文字。而这文字当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依类象形，叫作文；一类是形声相益，叫作字。将文字着附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就叫作书。可见古人关于书的概念，是指书写。书写之义进一步演化，就成了凡有文字者即都可称为书，因为上面书写有文字。

关于“籍”，《玉篇》一书引用孔安国古文《尚书·序》的疏文，说“籍”是借的意思，即借用竹简以文字记录政事，带有登录、记载的意义，所以叫作籍。这和“书”的概念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后人便将两字相叠，形成了“书籍”这个名词。

《后汉书》记载东汉时马融于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当上了校书郎，奉命在东观典校秘书。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写了一篇《广成颂》。他在这篇颂文的小序里，自己谦称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这大概是关于“书籍”一词较为明确的记载。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记载蔡文姬的父亲蔡邕（yōng），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深受朝廷敬重。他家经常是车马盈门，高朋满座。一次他正在欢宴宾客，忽然听说王粲已来到门外，慌得他倒穿着鞋就出来迎接。等接进门来之后，众人一看，不过是一位矮小瘦弱的年幼书生，都感到惊奇。蔡邕看透了众人的心思，就对大家说，王粲是名门之后，有特殊的才学，我不如他，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当让给他，以示自己甘拜下风。这大概是“书籍”一词更为明确的记载。可见东汉后期“书籍”一词的概念，已和现在差不多了。比起前边所说的“凡有文字者都可称为书籍”的时代，显然是大大地前进了。因此，关于“书籍”的概念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文字记录性质的档案材料，可以叫作初期书籍；一个是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这可以叫作正规书籍。这说明，书籍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书籍的概念也有个演变的过程。

## 二书籍史的主要内容

谈到书籍，人们通常想到的多是现代书籍的内外形象，顶多还能想到古籍线装或古籍包背装的内外形象，再久远的书籍就难以想象了。其实现代人们通常所能想象的书籍，还是正规书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规书籍的出现，不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很晚以后的事情，也是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很晚以后的事情。早期的文字记录，例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虽然算不上正规书籍，但它们却为正规书籍的产生作了各方面的准备，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初期书籍的特定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书籍的初期形态。因此，中国古代书籍史自然就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初期书籍阶段，一个是正规书籍阶段。书籍史的任务，就是要追寻这两大阶段中书籍发展的轨迹，揭示它们的演变规律。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它既具备一般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又具备一般社会产品所没有的意识形态。凡是书籍，无论是初期书籍，还是正规书籍，都是人的某种意识的反映。所以有人说，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话很有道理。既具有意识形态，就和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人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相划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以阶级、阶层相划分了。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层的印记。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及各个阶层的人，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识形态、观察社会、理解人生，以及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各种问题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阶级、阶层的色彩。这种客观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阶级、阶层意识，反映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阶级、阶层特色。

在人类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形态除了受阶级、阶层制约，还要受时代制约。中国古代各个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夏、商、周是奴隶制时代，固然与之后的封建制时代呈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是封建制时代，由于朝代的更迭，也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同，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时代特点。这些不同的时代特点，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折射在书籍里，也就使书籍带上了时代特色。

当然同是一个阶级，甚至是同一阶层，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由于生平际遇的不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同是一位作家，由于前后地位的变化，或是前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想感情。所有这些，反映在作品里，折射在书籍中，也就又使书籍带上了个人特色。

所以有人说，书籍一经产生，就会凭借其物质载体从人的主观意识中游离出来，异化为一种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书籍的内容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妙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所包含的意识都各具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一个方面。

人的意识传媒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所以当人们的某种意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或是社会科学的，只要物化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因为没有物质作为表现其意识的载体，意识将永远是意识。这是书籍构成的另一个方面。

书籍构成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制等。

文字是书籍构成的基本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产生书籍。文字不但承担着意识形态的构成任务，也影响着书籍物质形态的内外状况。如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就影响中国书籍既可以从右向左竖写、竖印、竖排，并因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右侧装订、书脊居右的特点；也可以从左向右横写、横印、横排，并因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又可左侧装订、书脊居左的特点。而有些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法、俄、德等外文，就只能是从左向右的横写、横排、横印，因而也就只能左侧装订，书脊居左，而绝不可能是从右向左竖写、竖排、竖印。这说明，文字不但是构成书籍的前提条件，还影响着书籍的版面形式和外部形态。

文字在人的头脑里可以被捕捉和运用而形成理性的意识，但这时还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意思，这种意思只要在客观上显现出来，就一定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一定有个载体问题。而文字的载体，实际就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世界上各个古老民族在各自书籍的发

展过程中，都曾经采用过不同的制作材料。外国人先后采用过纸草、树叶、树皮、砖刻、蜡版、铜叶、铅叶、金叶、亚麻布、羊皮、犊皮，乃至于人皮；中国则先后采用过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石鼓、石碑、石碣、石片、玉片、摩崖、竹筒、木牍、缣帛等。到人类普遍使用纸张来制作书籍，那已经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文字的载体，或者说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制作方法，或者说是书籍的生产方法也不同。从刀刻、笔写、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属活字排印，直到全人类共同使用铅活字排版印书，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纸张成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之前，不能想象书籍会用印刷的方法生产出来。同样，在以甲骨、石料、玉片为文字载体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用刀刻或笔写的方法来制作书籍，而不可能采用印刷的办法。古印度及东南亚以贝多树叶为文字载体制作书籍，也只能用铁笔将文稿刻画在贝多树叶上，而不可能用印刷的办法生产出贝叶书籍。可见不同的书籍制作材料，相应也就有其不同的书籍制作方法。

由于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形式，或者说是书籍的外部形态也不同。片片不甚规则的甲骨，其装订只能是中间钻孔串连；片片有规则的竹木简，便可以用绳子串连或编连；缣帛是丝织品，柔软坚韧，自身相连，因而帛书的装帧形式既可卷起收藏，也可以叠起置放。纸张兼具缣帛的柔软，更易成型，因而先是仿效缣帛采用卷轴装，后又出现经折装、旋风装。待到书籍的制作方法发生巨大变革，即由手写转换为雕印，影响到书籍的装帧形制彻底过渡到册叶式的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书籍构成的物质要素，或者说由它们协调有机组合起来，便构成了书籍的物质形态。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古代的书籍，但书籍是社会的产物。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什么样的世界观构成书籍的内容；以什么样的物质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什么样的技术作为书籍的制作方法，以什么样的工艺构成书籍的内部形式和外部形态，都不是可以自由选择，而是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书籍自身的历史，还应包括能够影响书籍生产倾向、生产数量、流通倾向的图书事业。

所谓图书事业，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图书活动。它既包括国家行政扬抑下的图书活动，也包括人类文化褒贬下的图书活动。研究这两方面抑扬下书籍生产、流通的兴衰，就是图书事业的全部内容。

书籍的发展，包括书籍自身的演变和图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所谓必然性，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指书籍自身所固有的必然的内部联系和图书事业兴衰演变必然的外部联系，以及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关系。揭示书籍自身演变的客观规律，阐述图书事业兴衰的历史必然性，概括它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状况，则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承担的又一任务。

从初期书籍、正规书籍两大阶段入手，从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两个方面切入，从整个图书事业的大背景着眼，便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方法、结构与内容。

## 第二章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 一语言、传说与记事

文字是书籍构成的最基本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书籍。但文字并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它的发生、发展，一直到成熟定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或者说文字是无声的语言。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彼此之间也常常需要交流某种意图，表达某种思想，交换某些经验。要完成这些交流，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凭借，只有靠声音与动作的结合来达到目的。后来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表达某种意图的声音逐渐定型，为更多的人所熟悉，所掌握，所共识，这就产生了最初的语言。

语言的形成并不断丰富，对于人类文明及其进步有着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语言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讲完就没有了痕迹，二是受到障碍或离得太远就听不清楚，或者根本听不到。因此，人们要了解远方或过去的事情，光靠单纯的语言就无法达到目的。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人们便把语言与记忆结合起来，将需要传播的知识、经验或事件，用简括、凝练的语言固定起来，编成歌谣、谚语、口诀、故事等，彼此相告，代代相传。这就是所谓的传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上古时期某些美妙动听的故事和历史知识，很多就是靠那时聪明、智慧的先民用“传说”的办法流传下来的。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wā）炼石补天、有巢氏绝穴筑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伏羲氏画八卦、后羿射日、共工触不周之山等动人的故事，就都是上古时代著名的“传说”。

但“传说”的基础是靠人的记忆。记忆的时间一长，就容易被遗忘，或发生错误。因此，靠记忆而流传的东西就往往发生很大的出入。不但内容事实会有出入，不同人的叙述，乃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里的叙述，从语言的运用，到渲染的情节，也会有出入。所以一件事情，经过若干人的口耳相传，往往就会离开原样，难以置信。怎么办呢？上古的人们认为这还是记忆不牢的缘故，于是仍在加强记忆上打主意、想办法。世界上各个民族几乎都曾有过这样的阶段，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不同民族也流行过不同的实物记事方法。目的都是为了以实物加强记忆，从而增强“传说”的可信程度。《周易·系辞》中曾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guài）。”清惠栋《增补郑氏周易》卷下引证郑玄对“结绳”的解释曰：“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对“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则解释曰“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决者，决也。造立书契，所以决断万事，故取诸决也。”大意是说上古以结绳记事的办法来治理社会，后世圣人将结绳换成了书契，就是将事项书写于木，镌刻在旁边，以便其后考合。《庄子》卷四《胠（qū）篋篇》中也说：“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也是说古帝先王之世，虽结绳而治，但各自独乐其乐，相安无事。这些记载说明，在我国上古时期确曾普遍流行过“结绳记事”之法。我国其他许多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上，也曾有过结绳记事或类似结绳记事的时期。像我国古代云南的僂僂（lì sù）族、哈尼族、鞞鞞（dá dá）族及台湾的高山族等，就都曾经流行过结绳记事或类似结绳记事的办法。外国如波斯、秘鲁等，也流行过这种方法。（图一）

### 图1 我国云南僂僂族用过的记事结绳

尤其是古代秘鲁人，据说记事用的绳子非常讲究。他们在一条主要绳索上系上各种不同颜色的细绳，用来记录不同的事物。如红绳代表军队，黄绳代表黄金，白绳代表白银，绿绳代表粮食。绳子上再打结，以代表不同的数目。一个单结代表10，两个单结代表20，一个双

结代表 100，两个双结代表 200。据说古代的秘鲁，每个镇上都设有官吏，专门管理结绳之事，并负责对结绳意义的解释，这是现在所知世界上最具体、最完整的结绳记事办法。孔安国《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什么叫政？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较深的理解。据说现代还有人能通晓古代秘鲁人结绳记事的意义。

除结绳记事，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还流行过刻木记事等办法。云南省博物馆陈列着一件佤族以前留下来的刻着大小不等锯齿的长木板。木板上的每个锯齿都代表着一件事情。缺口深的，表示事件重大；浅的表示事件较小。如果再发生新的事情，就根据事件的大小再加刻深浅图 2 我国云南佤族用过的记事刻木不同的锯齿。每年到吃新米的时候，就由一位德高望重而又通晓锯齿含义的老人，讲解一次木板上每个锯齿所代表的事情。他们就通过这样的木刻，把历年发生的事情一个一个地妥善解决，求得和协共处。难道这不正是社会政治吗？德高望重，表示着其自身的权威，也表示着人们对他的信任。吃新米，表示一季新粮的收获。这时该还账、该奉公的粮食都应办理了。此时如果讲解人不秉公办事，而是信口胡说，那就乱套了，就该闹事了，社会也就不稳了。这岂不是政治？

图 3 我国苗族历史上使用过的鸡毛信结绳、刻木之外，古代的人们也还有用数禾秆、数包谷粒，或者在树皮上、兽骨上、石头上刻点等方法记事的。还有把几种实物拼凑在一起，来表达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的。在我国苗族的历史上，就曾用一根一尺长的细木棍，一头劈开，夹上鸡毛、火绳和两只辣椒，作为通报紧急情况的信件送出去。对方的人只要一见到这样的信，就知道那里是十万火急，会立刻派人赶来相助。这就比结绳、刻木表达的意思更复杂、更进步了。

结绳也好，刻木也好，其他的办法也好，都还只是为了加强人们的记忆，从而加强口耳相传的可信程度。特别是当这些办法被约定俗成以后，就能代替传说和语言而传之久远。但结绳和刻木等毕竟还不是文字，也不能代替文字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它们只不过是记忆的辅助办法，还远不是语言的符号。真正能够为人们传情表意、交流思想并具有超时空效用的语言工具，还是文字。但结绳、刻木记事的长期实践，不但在思想上不断促使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在实践上它们也为文字的出现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二文字的起源与形成

图画是文字的前身，是远古人们交流思想的一种新工具。据考古学家们考证，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在他们居住洞穴的墙壁上画画。有些画画得还很逼真，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例如要打猎，就画出一头鹿或一头牛和一个手持弓箭的人。作为信息公布出去，这样就达到了交流思想、约同狩猎的目的了。所以有人把这种图画就称为图画文字。起初，这些画要画得很复杂、很细致、很逼真，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懂。待到人们对某些画所代表的意义都熟悉了，画的结构和笔画就开始简化。即用简单的几笔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就行了，于是图画开始向符号演变。比如一头牛，有的勾勒全形，有的只画一头两角。就是画全身，所取的角度与侧重也不完全相同。这表明，从图画演进到符号，再从符号演化为文字，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 图 4 云南纳西族的图画文字——东巴文

1987 年 12 月 11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 5 版，报道在河南省舞阳县城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出距今约 8000 年前的甲骨契刻符号。这些契刻符号，刻在随葬于墓中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比以往发现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陶器上的文字年代要早一两千年。其中个别契刻符号的形体，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上的某些字很近似。这说明早在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汉字可能已由图画演变为符号了。

1988 年 12 月 25 日《北京晚报》第 8 版，摘登了《陕西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考古学者日前在西安的国际考古学术会议上说，汉字出现于龙山文化时代的晚期，即黄帝时代及夏代初期，并向出席会议的中、美、英、日、苏、法、加拿大、德国和香港的同行们展示了

10 余枚刻划兽骨、骨器的拓片和幻灯片。这些形体小如蝇头，笔画细若蚊足，刀法古拙，字迹清晰的符号和原始文字，其形体结构很多与殷墟甲骨上的文字近似。这说明在 5000 年以前，中国的汉字已经由图画经契刻符号演化而生了。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了。

### 图 5 汉字演变示意图

关于汉字的出现与形成，古人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圣人造的；有的说是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而《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就都说是仓颉造字了。把造字的功劳归于某个人，肯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文字一定是古代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而由某些人或某个人加以整理、规范和统一，则是完全可能的。《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古人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仓颉，黄帝史官。言古亦有好书者，不如仓颉一于其道，异术不能乱之，故独传也。”清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二谓“荀子言一而后精。后出古文云‘惟精惟一，先精后一，非古义也。’都是说要‘一于其道’，才能求精。后来有人作了新解，说是古来喜好文字的人很多，为什么都不能传下来，而唯独仓颉的字能够流传开来呢？其原因就是仓颉对纷繁不一的文字，做了整理和统一的工作。这虽不是古人所解之义，但也不无道理。因为能将纷纭复杂、众体不一、写法各异的文字统一起来，首先要求自己专一此道，精深此学，否则是绝对统一不起来的。

到公元前 9 世纪的周宣王时，对文字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结果产生出了“籀书”，也称为“古文”，又称为“大篆”。公元前 3 世纪，秦始皇灭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度量衡，实现了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这次文字整理和统一的工作，是由秦始皇的左丞相李斯主持进行的。整理的方针是以秦国通行的字体为标准，对周宣王时定型的籀文大篆加以简化和统一。整理出来的文字称为“篆书”、“秦篆”或“小篆”。与此同时，为了更便于书写，适应各级政府及军队公文往来的需要，又在小篆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字体改圆为方，笔画删繁就简，这就又产生了“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变成了通行的文字，小篆也就慢慢退出了通行文字的历史舞台。到公元前 1 世纪西汉元帝时，史游又作草书，称为“章草”。后来刘德升又创造了“行书”。三国时钟繇(yóu)又创造了“楷书”，从而奠定了汉字的基本形体。直到今天，楷书仍然是规范的通行字。

当然，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产生书籍，但书籍则是由文字构成的。所以孔安国《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就书籍的产生而言，孔安国的话不一定可信，可是说书籍产生于文字，又确实可信。

### 三初期书籍的产生

所谓初期书籍，系指早期的文字记录，或者说是档案材料，如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刻资料等。这些东西，你说它是书籍，却又缺乏正规书籍的完整概念；你说它不是书籍，它们又确是在当时人们思想支配下进行某种活动的忠实记录，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字显现，具备了书籍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初期书籍。

中国初期书籍可能早就产生了，但保存下来，传至今日的却没有。人们描述中国的初期书籍，多以商、周时期留存下来的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资料为例，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初期书籍到这时才产生。初期书籍，在时代上固然应该产生在正规书籍之前，但正规书籍产生之后，初期书籍仍在继续不断地产生。因为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随时随地都在产生，什么时候人们也不会将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看作正规书籍。但当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经过加工整理，成为系统地宣传、介绍、传播某些问题、某种经验和某种知识时，便成了正规书籍。所以讲初期书籍，不仅是时间早晚方面的概念，还有形式和内容不同于正规书籍的概念。

#### (一) 甲骨文书

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进行契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习俗。但作为文字记录，或者说是初期书籍，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还得算是一百多年前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朝首都遗址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书。所谓甲骨，系指龟甲和兽骨。契刻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或甲骨文书。

一百多年前，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耕地、挖土过程中，就常常发现大小不同的甲骨。当时农民迷信，就说这是龙骨，并且附会说它们能治病去疾。久而久之，殷墟的这种甲骨就有卖到北京药房的，正式作为中药出售。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写《老残游记》的洪都百练生刘鄂（刘铁云）客游北京，拜访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山东福山人王懿荣。正赶上王懿荣身患疟疾，请大夫诊治。医生看病后开了一张处方，其中有一味药就是“龙骨”。家人持方将药抓回，刘鄂发现这味“龙骨”上刻有文字，认定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古代文物。于是他便开始搜集、研究甲骨，从此甲骨便成了古物收藏家搜罗的对象。一百多年来，大约有10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从殷墟先后出土，分藏在中国及全世界各地。研究这些甲骨的中外知名学者大约有三四百人，写成了1000多种甲骨文研究专著，遂使甲骨之学成了一门独立的专门之学。

197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周原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15000多片。其中有一部分也刻有文字，并且文字刻得非常小，要用5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可见当时的微雕技巧已经相当精熟了。

殷商甲骨也好，西周甲骨也好，只有少数是记事性质的文字。如“雀入百五十”、“昼入百”等，就说的是入贡甲骨人的姓氏及所入贡甲骨的数字。还有些牛骨上刻记着宫廷大事。殷墟甲骨中还有用兽骨作成的骨简，上面刻记着狩猎、战争等活动的史实。但这种单纯记事的甲骨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卜骨，即用来进行和刻记占卜情况的龟甲和兽骨。

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并在上面刻记占卜情况，可能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习俗。到了殷商时期，虽然人类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当时的人们，包括有文化的贵族和统治者及其史官，仍然都很迷信。凡遇有关国家的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事，都要求神问卜。

占卜的方法是在占卜之前要先将龟甲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或凿出梭形的浅槽，但不能透过骨面。占卜时，将所要问卜的事项先向神灵讲清，然后用燃烧着的木枝在深窝的中央或浅槽的边缘烫灼。甲骨一经热烤，就会在正面出现各种不同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卜兆。据说神灵的意志就从这些卜兆中委婉地表现出来。卜人就根据这种卜兆裂纹的粗细、长短、曲直、横斜、隐显等形状，来判断所问战争的胜负、狩猎的得失、农业的丰歉、疾病的轻重、风雨的有无等。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占问的事项，占卜的结果，卜人的姓名及事后应验的情况，都镌刻在卜兆的附近。这种文字因为是镌刻在甲骨上，所以称为甲骨文。又因为是占卜的记录，所以也称为卜辞。这些卜辞虽然都是占卜的记录，不同于专门记事的甲骨，但从它们具有的占卜时间、占卜事项、占卜结果、应验情况、卜人姓名等看，也未尝不是史实的记录，颇有后世正规书籍的某些意味。且这些占卜完的卜骨收藏之前也要中间钻孔，串连成册，有次序地保管起来。表明殷周时期的甲骨，有记事的内容、有装订的形式、含有某些后来正规书籍的味道，所以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 图6 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二）青铜器铭文

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还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流行。虽然这些铭文也只是早期的文字记录，还算不上是正规的书籍，但铭文的记载从形式到内容，以及文字的长短，毕竟已和甲骨文不同，所起的书籍作用也更明显。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它们也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因为加进了一定比例的锡，铸造出来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就叫青铜器。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就称为“铭

文”，也称为“金文”。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是极受珍重的器具。它的品类很多，大体上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其他日用器具。这些东西当时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用品。特别是其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更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传家宝，只有在举行大典或隆重祭祀时才能动用。尤其是礼器中的大鼎，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被视为国家“重器”，必须极力保护，不能失掉。如果是易主失掉，就表明这个国家政权被摧毁了。因此，后世朝代的更迭常被说成是“鼎革”，其出典便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交战双方凡一个国家被消灭，就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就是表示鼎革之义。所以在战争中将要失败的国家，就常常将这种重器埋藏地下，只要重器不失，就意味着他的国家尚未最后消亡。贵族死后，也常常将生前使用的青铜器殉葬，继续表示死者的地位和尊显。所以从西汉起，历代都有青铜器的出土和发现，迄今已得几万件，其中带有铭文的也有10 000多件。

最初的青铜器上只铸刻所有者的名字。随着青铜器的被珍重，贵族及其统治者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纪念的重大事件，铸刻在青铜器上。这样，铭文的字数也就不断增多、加长。例如西周初年的宜侯矢簋(guǐ)、周康王时的大孟鼎，郑国、晋国的刑鼎，以及传世或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盘、虢(guó)季子白盘、史嗇盘等，就都是铭文较长的青铜器。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铭文已经长达四五百字了。这些铭文都很重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例如宜侯矢簋铭文，记载周成王把一个奴隶主贵族封到今江苏丹徒附近的宜地去，赏给他大量土地和两千个奴隶。周康王时图7史嗇盘及其铭文大孟鼎的铭文，记载周康王一次就赏给大奴隶主孟659个奴隶，13个管家奴隶，另外还有1 051个少数民族的奴隶。这说明当时的社会仍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至于郑国、晋国的刑鼎，则是直接把国家的法律铸刻在鼎上，目的是为了晓谕全国，一概周知，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们视为最早的法律专著。所以过去有人将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就称为青铜书，虽然未必十分确切，但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则是毫无问题的。

### (三) 早期石刻文字

在石头上写、刻文字，是上古人类许多民族都有的风气，我国也毫不例外。《墨子》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话，这当中的“镂之金石”，就说的是在金属器皿上和石头上铸、刻文字的事实。表明墨翟(dǐ)生活的战国初期以前，的确有不少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但直到今天为止，我国早期石刻文字发现得并不多。在现存石刻文字实物中，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zhì)原发现的10个形状似鼓的刻石。每个鼓身的周围都刻有文字，字体属于籀(zhòu)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是一首颂记秦襄公田猎活动的四言长诗，全文约有700个单字。唐代发现后陈列在凤翔县的孔庙内。到宋代又把它们迁到汴京(今开封)。金人攻破汴京，又将石鼓移往燕京。元代皇庆年间(公元1312—1313年)又移置大都(今北京)国子监内。到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保护石鼓不再遭受损坏，命人仿刻了一套，放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内。“九·一八”事变后，文物南迁，石鼓亦迁往南方，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8刻有文字的石鼓。由于长期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剥蚀严重，字多漫漶(huàn)，全文早已模糊不清，其中一石的文字已荡然无存。从诗的内容看，虽然是歌功颂德，但它却是有意创作的诗篇。从载体上看，虽然是取石为料，却是有意地经过加工，造型似鼓，大概是取其容字面积最大。尽管仍不能像后世书籍那样展卷阅读，但它所具备的书籍意味，较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更浓了。所以我们把这类早期石刻文字也视为初期书籍形式之一。

除了在石头上刻字，古人还有往石片、玉片上写字的习惯。古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乃至士大夫与奴隶之间，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常常需要协调一致，相互约束，向神盟誓。盟誓前要先写好载辞，而后歃(shà)血定盟。立盟之

后，盟辞要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动摇，不断发生战争，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更盛。1942年，在河南曾发现几十片玉片和石片，上面有墨写的文字，内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载书。1980年，河南再次发现大批古人盟书。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盟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玉片，三分之二是石片，一共有5000多件。它们的形状为上尖下方，长宽厚不尽相同。在它们的上面很多都写有毛笔字，有的呈墨色，有的呈朱红色。经过专家们考证，现在可以认读的约有600件，内容多与赵鞅有关。赵鞅又称赵简子，是当时晋国的大官，是奴隶主贵族中的一员。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时代。受时代潮流的冲击，赵简子便图 91965年山西马春秋晚期晋国遗

址出土的盟书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以奴隶主贵族逆子贰臣的勇气，代表新兴地主向旧势力展开了斗争。当时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结成军事联盟，对赵简子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些诸侯国家也支持守旧势力，反对赵鞅。为了在斗争中团结内部，争取胜利，赵鞅就和同宗的人举行了一系列盟誓，这是侯马盟书的一类内容。有一次，赵鞅要同帮助守旧势力的郑国作战，由于对方力量强大，使赵鞅处于劣势。于是他便采取措施，争取奴隶的支持。他在盟誓的载辞中宣布，只要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立了军功，农业生产的奴隶，工商业方面的奴隶，以及家庭奴隶，都可以免除奴隶的身份而成为自由民。盟书中还有的内容是限制“纳室”的。“室”是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占有财产的单位，其中也包括奴隶和土地等。“纳室”就是夺取其他奴隶主的奴隶和土地。赵鞅在盟誓中限制纳室，就说明他是反对用夺取奴隶和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奴隶制的剥削和统治的。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所有这些书写在玉、石片上的内容，虽然都是古人盟誓的载辞，还远不是经过创作或编辑的正规书籍，但它们却反映着彼时社会变革的信息，确也起着书籍的某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些早期刻、写在石质上的文字，也视为中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当然，以石头为材料来制作书籍，不仅早期如此，后世正规书籍也常采用石头为制作材料。如把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汉代的《熹平石经》、三国时魏的《正始石经》、唐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嘉佑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清代的《乾隆石经》。把释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摩崖，有经幢，有石经。以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房山石经》规模最大，共7000多块石头，420多万字。唐代中叶以后，有人把道家经典也刻在石头上了。这些，与早期的石刻文字性质不同，已是地地道道的石头载体的书籍了。

## 第三章 正规书籍的产生与历代书籍的创作

### 一 正规书籍的产生

前边说过了，所谓正规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这一概括表明，形成正规书籍首先是要有写书人的理性意识，然后经过编辑或创作用文字将其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形成著作物。即一要有理性意识，二要经过编辑或创作，三要用文字书写、刻、印在具有一定形式的材料上。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正规书籍。如果缺了某一方面，就形不成正规书籍。我国早期正规书籍虽然已具备了意识和编辑、创作两个方面，但其所着附的材料尚没有一定的形制，因而还不是完全的正规书籍，只能称为原始的正规书籍或早期的正规书籍。

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说的是中国正规的典籍早在伏羲氏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篇序文还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zhuān xu）、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进一步论证了早在三皇五帝的原始社会，中国就产生了正规书籍。这大概不太可信。

关于三皇五帝时产生的书籍，到了西汉孔安国为《古文尚书》写序时怎么不见了？孔安国《尚书·序》中还有一段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先君孔子生于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讫于周。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传世立教。”原来那时的书经过孔子的“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从而成了“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传世立教”的六艺之书了。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又说：“孔子之时，周室衰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以备王道，成六艺。”又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所有这些，表明在孔夫子之前，《易》、《书》、《诗》、《礼》、《乐》、《春秋》等这类的书久已行世，他只不过是加以传注、删削、整理，最终形成了六艺。大体与孔安国之说相一致。表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六艺这类的正规书籍确已产生，否则他以什么为蓝本进行整理呢？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整个生活的时代恰是春秋末年。这样，我们就可以孔子生活的时代为一断限，断定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中国产生了正规书籍。而孔子距今已有 2500 多年，这即是说中国至晚在 2500 多年前已产生了正规书籍，这是产生的时代下限。其上限起于何时，前面所引孔安国《尚书·序》已有了一个态度，我们还可以继续发掘材料，进一步求证这个问题。

当然，孔安国为古文《尚书》写序作传（注），历来被说成是后人的伪托之作。这牵扯到很多历史的疑案。孔安国是孔子 11 世孙，景帝末鲁恭王广其宫室而坏孔子宅，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经书，其中《尚书》较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 29 篇多 16 篇，到西汉武帝时由孔安国家奉献了出来。而在献出之前，孔安国有条件接触此书，故为之作传写序并不一定就没有可能。一定要说其伪，也并不一定有多确凿的证据。近年不伪之说甚盛，也不必忙

于下此结论。无论真也好，伪也好，我们用来讨论正规书籍的产生，不受太大的影响。

当然，孔子是否真的做了上述那么多整理工作，倒也有可研究之处。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曾经到鲁国观乐。鲁国为吴季札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本今《诗经》差不多。而吴季札赴鲁观乐的那一年，孔子才8岁，表明远在孔子之前，《诗经》也早已成书流行了。至于《春秋》，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曾向许多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国主张，都遭到拒绝，不被采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次就是编次，既是编次，就说明在孔子之前《春秋》也早已成书，否则孔子也就无所谓编次了。事实上鲁国早有国史，名字就叫《春秋》，孔子不过据此加以增删编次罢了。所有这些实例，都能雄辩地说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正规书籍的确是早已产生了。

至于产生在孔子之前的这些正规书籍，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编纂者，但我们也可以大体上推知。殷商和周王朝的前期，还是“学在官府”的时代，中央天子和王国诸侯的周围都有史官，他们负责记言记行，保管文献档案等。因此，当时藏书、读书乃至编书、著书的权利，都只能属于这些史官及其所服务的少数统治阶级贵族。这些人以外的一般人是无权问津的。所以，史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知识，又生活在贵族统治者周围，同时掌握着丰富的文献档案材料，这就给他们创造了极好的编书、著书的条件。孔子所删订的《六艺》原著，有的大概就出自这些史官之手。

现在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正规书籍产生的时代上限。《史记》卷二《夏本纪》记载：“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宋陈经《尚书详解》卷七《甘誓》篇名之下注曰“夏书”，可知夏启时已有关于在甘这个地方与有扈氏作战前所写的誓师记录，表明早在夏启时已有了《甘誓》这样的单篇文章。

《汉书》卷二十三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汤刑》，唐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注疏》解释说：“夏商之有乱政，在位多非贤政，在位多非贤哲，察狱或失其实，断罪不得其中，至有以私乱公，以货枉法，其事不可复治，乃远取创业圣王当时所断之狱，因其故事，制为定法。”可证这《禹刑》乃夏禹时就有了，可知《禹刑》指的就是夏时的法律，是刑律方面的著作。

《吕氏春秋》卷十六《先职览第四》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这当中的“图法”是什么？图法大概指的就是图写成的法度。

《皇王大记》卷六《商成汤》记载：“夏桀凿地为夜宫，男女杂处，三旬不朝。太史终古执其图法，泣谏不听，终古出奔商。”看来《图法》确是一种法度类的书籍。《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可知《图法》是一种书。表明夏桀之前已有了约束国王行为的法度，到夏桀乱政时太史令便以此为尺度劝谏其改正，夏桀不听，太史令只好出奔到商，以躲避灾难。

《尚书·多士篇》中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什么叫“成周”？汉孔安国解释说“成周”即“洛阳下都”。实则即洛阳的别称。“殷大夫士，心不则德义之经，故徙近王都教诲之”。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说：“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又说：“民性安土，重迁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语此众士，言其须迁之意。”意思是说殷的一些士大夫仍站在商纣的立场，不与周王朝合作，甚至反周，所以要把他们迁到靠近王都的地方，以便进行教育。他们故土难离，心存怨恨，牢骚满腹，所以周公出来以成王之命向他们训话。南宋吕祖谦撰、其门人时澜增修的《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四解释说：“以其父祖之旧闻而开谕之也。……尔先人典册所载殷革夏命之事，历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这里的“有册有典”，宋

王应麟的解释就是册书典籍。证明商汤革夏命之后，也曾迁移夏代顽民，此事在殷代先人的册书典籍里有明确记载。现在周革殷命，要将殷代顽民迁到王都附近的洛阳，不过是在做你们先人早已做过的事情。

综合上述这些记载，我们有理由认定早在夏王朝，中国正规书籍已经产生。只不过那时的正规书籍只具备理性的编辑创作意识，而书写在什么载体上，载体有无基本固定的形制，尚缺乏文献证明和实物验证，所以尚不能说它们就是完整的正规书籍，而仅是原始状态的正规书籍，或称为早期状态的正规书籍。这样就可以找到正规书籍产生的时代上限，即夏王朝。而夏王朝所居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因此我们说中国正规书籍大约在距今 2500 年至 4000 年之间即已产生，应该是可信的。可惜，那时正规书籍书写在什么样的材料上，久已不复可见，所以我们在探讨初期书籍形态时，无法借重这些正规书籍早期的物质形态，只得从殷墟甲骨、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资料等高、周实物遗存谈起。

正规书籍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意味着知识更加广泛、更加普遍地传播。所以到春秋后期便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过去少数人那种垄断知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一种新的思想在社会内部孕育着，萌生着。待到孔子以教育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更进一步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表明知识已突破少数上层人物的桎梏，向更广泛的士阶层飞去。士阶层就是知识阶层，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书籍创作要进一步发展。

## 二 历代书籍的创作

创作是书籍生产流程中的首要环节，创作者则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是从属于这个阶级，就是从属于那个阶级。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立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式，就不能不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而历代的书籍创作，不仅反映着创作者的阶级意识，也反映着相应的时代气息，还反映着不同创作者的不同倾向和不同风格。

孔子之后，特别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见，各申主张，这就是所谓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质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是思想战线上不同哲学观点的论争。在论争中，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彼此之间都极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以便战胜对方，弘扬自己，争取掌权者的采纳，以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正是这种活跃的论争，产生了大批私人著作，从而使我国正规书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书籍生产的第一次高潮。例如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还有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名家公孙龙、惠施；阴阳家邹衍、邹奭（shì）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汉以后称为《黄帝内经》）、药物书《本草》（汉以后称为《神农本草》）；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的《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

这时期的著作，特别是诸子作品，一般都长于思辨，这是百家争鸣局面所决定的。《孟子注疏》卷六下公都子问孟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汉赵岐注曰：“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论议者也。好辩，言孟子好与杨墨之徒辩争。”意思是公都子问孟子，他人都说你好与杨墨之流争辩，为什么？故孟子答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为什么不得已？赵岐注曰：“欲救正道，惧为邪说所乱，故辩之也。”这完全是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革在知识分子思想、立场上的鲜明表现。这两句话，可以代表先秦诸子的一般心境。就连文学作品，像屈原的《离骚》，也带有这种长于思辨的时代气息。可见，书籍的创作一开始就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相联系。

秦虽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专制大帝国，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推动中华文化继续发展。但其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使其不仅很快失去了政权，在书籍

创作上也未能留下不朽的篇章。

汉初，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曾一度遭受秦王朝严酷压制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如黄老学派、刑名学派，以及儒家学派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提倡，出现了一批有见地的政治家和有成就的文学家。像贾谊、贾山、晁错、枚乘、邹阳、庄忌等，都是这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们写下了不少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表明这时期的书籍创作，又趋于复苏。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本人，又是个文治武功都大有作为的人，这就与藩王出于政治目的而继续提倡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发生了分歧。汉武帝则以自己所掌握的政权力量，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以来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彻底结束，使经过董仲舒改造和解释的儒家思想和儒家作品，成了官方哲学和经典著作。从此以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虽然也经受过各方面的挑战，但始终处于统治的地位。因此，书籍的创作也受其钳制，常常围绕经学打转转。例如经注、经疏、经解、经书名物考证、地理考证、人物传记、释音、释名、释义等有关经学的著作，层出不穷，历朝都有。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中找到最初发展的源头。

“建安风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寻其形成的原因，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三国的统治者都亲历了黄巾大起义，目睹了人民的威力，加之他们出身都不高，因而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占据北方的曹操和他的集团，不但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文学思想上也体现了这一阶层的艺术趣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诗歌的创作者和提倡者，在他们的周围又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他们共同向乐府民歌学习，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打破了两汉以来辞赋独盛的局面。曹氏父子及追随他们的文人，又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目击者，他们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都有很深的感慨和同情。他们的作品就植根于此，不但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也表现了他们想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抱负和才能。刘勰在《文心雕龙》卷九《时序篇》中评论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家敢于正视现实、反映动乱而又富于忧国之思和拯世济物的宏愿。这就是建安作家的特点，也是建安作品的风骨。后世凡属文学创作上反对浮华，提倡注重现实，言之有物，多以建安风骨为典范。表明此期的书籍创作，特别是文学书籍的创作，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色的。

李唐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建国之初，李唐王朝借鉴了隋朝来去匆匆的失败教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权建设也很快在全国确立并得到了巩固。

李唐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各种宗教，都可以自由发展和传播。佛教尤盛，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都是佛教盛行的象征。佛经翻译规模更大，水平更高，佛教典籍突飞猛进地得到发展。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姓李，于是又追认老子李耳为他们的远祖，并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而老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鼻祖，于是他们又尊奉道家，崇尚道教。唐王朝的科举考试，就曾一度把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列为必读之书。因而道家与道教著作也得到了整理和创作。唐王朝从皇帝开始就提倡文学，尤其崇尚诗歌，甚至发展为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所以唐代诗人辈出，诗篇迭现，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光收入《全唐诗》的就有2 873位作家，近50 000首著名诗作。散文在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改革提倡下，也有辉煌成就，开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先河。适应诗歌创作的需要，供查检典故的类书和供查检韵字的韵书，也先后被增补、编纂出来。小说也由以前的志怪、灵异、琐语、轶事等笔记小说发展为唐人传奇式的短篇小说。唐朝还非常重视数学，国家专门开有学习数学的太学堂，因而对自古流传下来的数学著作，如《周髀（bì）算经》、《九章